

《五号屠场》中表现荒诞的形式

西北师范大学外国学院 赵秀兰*

摘要: 本文将文本分析和存在主义论文思想相结合,分析了现代主义作家冯尼格的作品《五号屠场》中表现荒诞的形式。

关键词: 荒诞 冯尼格 《五号屠场》

人类的生存状态一直以来都倍受作家们的关注,是文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西方世界,由于“上帝加理性”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存在,作家作品中反映出人们的生活状况给人一种还算过得去的印象。自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讯以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世界的无序、现实的无奈和生存的无望。人要想有立锥之地就不得不依据“丛林法则”进行残酷的竞争。这些在很多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的笔下都生动逼真地表现出来。当人类迈入二十世纪,在尼采、柏格森和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下,非理性思潮不断高涨,面对残酷的战争,人们日益感到世界的无序和混乱以及个人的渺小。两次世界大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的价值观,在对上帝的漫骂声中作家们纷纷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现实的荒诞感,对人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可以说卡夫卡最早感受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也是最早在作品中传达这种时代特征的人。他在《地洞》中描写出了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地洞”就是现代人处境的象征性写照。二战的爆发,使人们直接面对死亡的恐惧,对现实世界的恐惧和未知世界的迷惘,很多作家把战争与人们生活的现实联系起来揭示人们的生存境遇,现代主义作家冯尼格便是其中之一。60年代末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亲历了二战的冯尼格抓住这一契机,用独特的写作手法描写战争,制造出一面反映战后美国的哈哈镜,对美国现实的荒诞性和战争的荒诞性进行挖苦和攻击。他充分运用戏拟、自由联想、意识流、时间旅行和电影特写镜头式的描写等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使战争及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荒诞性突显出来。正如卡夫卡那样,冯尼格也运用了简练得几近枯涩的笔调、冷静得几近冷漠的口吻揭示出人的生存状态、生活的无意义和战争的荒谬。冯尼格曾于二战期间被德军俘虏在德累斯顿服苦役,并亲身经历了美丽的德累斯顿在14小时内被盟军炸成一片废墟,这一事件影响了他之后的生活。因此,对于战争与生活,他有着别样的感受。往事萦怀,他只能通过创作,用文字来排遣其忧郁凄苦的内在情感,表达对战争、生命的深切体验。

1. 荒诞的形象

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言,荒诞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分裂,即人和生活、社会的一种分离,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冯尼格在《五号屠场》中正是塑造了这样一位游离于生活、与战争和社会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毕利。由于冯尼格经常回忆和反思自己的战争经历,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荒谬,所以一开始就把这本小说定位为反战小说。所以,毕利并不是一个传统战争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他软弱、怯懦,是一个对敌无害、对友无意的“反英雄”形象。其他人物也跟毕利一样年轻,外形丑陋,毫无战争经验,甚至连最起码的正规军事训练都没有参加过。作者无意在小说中描写战争,他所关注的只是战争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

* 赵秀兰(1971-),女,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联系地址: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730070。

义、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因此，长得高而瘦、外形像一只可口可乐瓶的毕利是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作为随军牧师派到欧洲去参战的。而“美军里的牧师助理通常是个可笑的人物。毕利也不例外”（冯尼格特，1998）。可等他到达卢森堡时，他所在的团已经被德军歼灭。他甚至还没来得及见见那位他准备协助的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虽然毕利幸存了下来，但他手无缚鸡之力，而且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毫无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只能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跟在三个没有食物、没有地图、衣衫褴褛的散兵游勇后面四处逃窜，躲避敌人的攻击。毕利两手空空，没有大衣也没有武器，又冷又饿，脚上穿的廉价的短统民用鞋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才二十一岁的他已经“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同上）一行四人毫无目的地到处躲避，尽量避免与敌人遭遇，可还是时不时地会遭遇冷枪。一个叫韦锐的同伴“一直在保毕利的命，咒骂他，踢他，打他耳光，拽他走。对毕利残酷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毕利对保全自己的性命无所作为。”（同上）尽管几个人竭力避免被德军俘虏，可冯尼格似乎和卡夫卡一样对宿命论深信不疑，所以，毕利他们最终难逃被俘之劫。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得知，作者根本没打算把毕利塑造成一个英雄形象。读者也就不会去设想这样一个软弱无能、任人摆布的人会有什么英勇行为。正当韦锐猛抽毕利时，五个德国兵和一只用皮条系着的牧羊狗在所谓的“扫荡”中俘虏了他们。同样，这些人也不是正规军。两个是十几岁的孩子，两个是走起路来踉踉跄跄、老掉了牙的傻瓜，他们是德国边境的农民，是用从刚死的正规军身上取下来的破烂衣服和武器胡乱武装起来的。而他们的指挥则是个负过四次伤经过治疗又被送到战场上的厌恶战争即将退役的中年班长。在运输战俘的火车里塞满了老弱病残的战俘，在这样的情况下，俘虏们应该团结一致，共度难关。可为了能让自己舒服一些，他们相互吵骂，小说中充满了这样荒诞可笑画面。面对这样的荒诞，人的尊严已荡然无存，人之为主体的主体性被消解，不仅丧失了自由意志，而且无力改变自身的处境。毕利只能任人摆布。虽然处处受人欺负、时时让人辱骂，毕利还是选择了淡然面对，从不抱怨，因为他明白这一切都是注定的。不论是他的婚姻还是职业还是到欧洲参战，都是安排好的，他本人没有丝毫的自由意志，总是感到前途暗淡、毫无希望，自己无力改变荒诞、不合理的现实，人只不过是“一只镶在琥珀中的虫子”而已，厄运随时都会降临到他身上。

小说充分地运用了意识流的写作手法展示了一个与外界缺乏沟通、被孤独和痛苦所包围的人对于现实的感觉。对毕利来说，现实是混乱无序、根本难以理解的，命运的安排是无法抗拒的，人只能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淡然地面对荒谬的境遇。冯尼格通过毕利告诉我们，在强大的非理性面前，人们可以用非理性的手段来对抗，从而给自己带来些许的安慰。所以，当毕利遭人毒打时，他还能微笑着面对残暴。认识到生活的无意义和战争的荒诞后，毕利只能消极厌世。他幻想去514号大众星上做客，并通过514号大众星上众生相之口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战争是荒唐的，而人类想通过战争来改变自然的进程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整部小说中都渗透着宿命论的思想，人的各种境遇看似偶然却是注定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时时受压制、处处受限制。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但他同时强调人是自由的，人应该超越荒诞的现实，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创造自己的本质。与萨特不同，冯尼格的作品中虽然也反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但他所创作的人物没有自由，因此最终选择了逃避。无法掌握命运的毕利不再继续他的配镜师的工作，而是整日无所事事，耽于幻想。《西绪弗斯神话》中西绪弗斯意识到存在的，于是他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作为对命运的反抗。而毕利则把逃避当作对无法抗拒的现实的抗议。和加缪的《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一样，毕利对现实的一切也是冷漠、麻木的，他似乎对一切发生在他身上及周围的事情都淡然视之。正是这种不屑一顾或麻木不仁的态度折射出他的世界观——世界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作者一再地告诉读者，人们应该忘掉不愉快，能享乐就享乐；应该专注生活里的快乐时刻，不必去注意那些不快活的时候；当永恒还没有逝去时就要一直望着美好的事物，因为不论发生了什么，人们还是不得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作者用这种玩世不恭的幽默，不露声色地表现其内心的痛苦和失望。

《五号屠场》中的语言简单朴实，作者用墨到了极端吝啬的地步。虽为一本战争小说，其中却既没有大段的用以渲染气氛的环境描写，也没有硝烟密布、血肉横飞、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平面的，因此缺乏深度和活力。作者运用冰冷的语言，不论是对战争还是主人公的描写都只是素描般的寥寥几笔。也许是由于战争和现实太过残酷，任何语言在这样的无情面前都显得平乏无力，所以，作者只是用了语言碎片来表达人们面对战争时的恐惧和无奈，这也使得小说具有篇幅短小的特点，但寥寥数语，微言大义、发人深省。

2. 荒诞的情节

为了说明世界是混乱无序的、根本毫无理性可言的，作者真是煞费苦心，用一系列似真似幻、纯粹偶然的事件来给读者留下荒诞不经的印象。在小说的开始，作者并没有交代清楚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人物，（小说并不是要讲述什么故事），读者对主人公的了解只能从之后通过他在逃亡与被俘过程中间断而又混乱的“回忆”中得到。毕利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此他的回忆是断断续续、不断跳跃的。而作者又让他得了时间痉挛症，让他随意地“进出”他人生中的任意时刻，使整本小说看起来就像很多片段随意杂乱地拼凑而成，根本没有情节结构可言。许多看似不可能发生的、荒诞离奇的事件并置在一起，错综复杂、似真似幻，降低了故事的可信度，但间或会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出现表明这一切“不可能”发生的事确为事实，让读者难辩真伪。

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告诉读者，德累斯顿城被盟军一夜之间炸为废墟，除了那些在第五号屠宰场的地下室工作的战俘外，城中其他人全部罹难，死亡人数多达十三万五千。实施了轰炸的英美联军无人愿意对此事负责，而一个可怜的战俘，虽在轰炸中幸存了下来，但还是难逃死亡的命运。就因为他在被派去挖死人坑时，从一个地窖里拿了一个茶壶而以抢劫的罪名给枪毙了。战争中目睹了一幕幕惨剧都未曾掉一滴眼泪的毕利，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嘴被马嚼子勒了很深的口子在流血，马蹄子也裂开了时，却不禁泪如雨下。后来，当毕利因所乘坐的飞机失事而住院时，他妻子开车前往医院看他，中途汽车出了故障，等到了医院却因为吸入过量的一氧化碳而死亡。

在飞机撞毁后，毕利回到了埃廉市自己的家里过了一阵子安静的日子。他不再重操旧业。后来，毕利便来到纽约市通过广播电台大谈挣脱时间羁绊的问题。他还说他在1967年被一架来自541号大众星的飞碟绑架。在那里，他被光着身子放在动物园里展览，并与在那里的女电影明星蒙塔娜·怀尔德赫克结为夫妻（同上：22）。他说，他是他女儿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被绑架，谁都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541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他在那里学到：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一个人死后，这个人只是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同上：22-23）。毕利认为许多人之所以迷惘、沉沦，是因为他们不能像他那些在541号大众星上的朋友那样对事物看得那样透彻。毕利说他首次摆脱时间的羁绊是1994年，远在他去541号大众星之前，与大众星毫不相干，他们只能让他洞悉事物目前实际进行的情况（同上：26）。书中这样的例子真是俯拾皆是。

许多无意识偶然拼凑的情节使作品成为零碎意象的大杂烩。作者用一些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并置一起来揭示可能发生或实际发生的事情，从反面揭示了人物所处现实世界的本质，寓真理于荒诞不经的形式之中。小说名《五号屠场》并不是单指德累斯顿城中的第五号屠宰场，其包含了更深刻的意义，即战争就是一个巨型屠宰场，而战争就像冰河一样难以阻止。“即令战争不像冰河那样不停地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同上：5）。战争使原本荒谬的现实更加荒诞，使人们的生命毫无价值、生活毫无意义。

3. 荒诞的叙事

《五号屠场》中的故事情节不具有传统小说的那种逻辑性和连贯性。作者打破了线型的叙事方式，将现实时间、历史时间和未来时间随意颠倒，将现在、过去和将来随意置换。传统小说的特点，如意义的连

贯，合乎逻辑的人物行动，完整封闭的情节结构，在《五号屠场》中全然不见。传统意义上的时间被消解，作者的心理时间取代了物理时间，用充满了错位式的开放性情节结构取代了传统结构，赋予毕利“时间旅行”的能力，利用类似于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让毕利穿梭时空隧道，随意地往返于其从出生到死亡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将现实空间不断地割裂，令读者分不清哪些属于过去，哪些属于现在亦或未来，使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精巧，于平淡中见深意，看似简单却富有哲理。

在小说的第一章中，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说，他在写一本有关他在德累斯顿的亲身经历的书，一本反战的书，并告诉读者，“关于现在，我自问：它有多宽，有多深，我有多少东西能留存？……我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一下就算一年”（同上：17-18）。这些为毕利的“时间旅行”埋下了伏笔，而且作者还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说，因为他回顾了战争，就可能像《圣经》中罗得的妻子那样，变成盐柱子。作品中其他几处《圣经》典故的运用均证明了作者很善于通过戏拟的手法利用《圣经》中的一些典故揭示现实的荒诞。

从第二章开始才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毕利一出场，作者便告诉读者，他患了时间痉挛症，因此，毕利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任何一件事当中，且无法控制下一步将往哪儿去。他就寝时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在举行婚礼（同上：20-21）。之后，毕利便不断地穿梭于他生命中的任何时间，作者也因此拥有了更大的叙事自由。这也是冯尼格在小说艺术上的创新之一。

在《五号屠场》中作者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时间概念，而且还将现实、幻觉、回忆交织成团。“毕利正陷入愉快的幻觉中。他穿着干燥、温暖的白色弹力袜，在跳舞厅的地板上滑步。数以千记的人为他喝彩。这不是时间上的旅行。这事从未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发生。这是一个鞋子塞满了血的正要死的年青人的胡思乱想。”小说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交错混杂就已经给人以叙事混乱的感觉，这样现实和幻觉的交织使故事情节在表面上看来杂乱无章。但其实，读者要是耐心，细心地去梳理就会发现看似混乱的叙事还是有章法可依的。例如：当他们在德军后方逃亡时，毕利在森林里停了下来，依靠在一棵树上闭上眼睛，“他的注意力开始庄严地回旋在他生命的圆弧中，达到死亡，只有紫色的火光和嗡嗡声。……接着，毕利又回到活的时刻，再倒退到出生之前，这时是红色的光和噗噗声。然后他又回旋到活的时刻而停了下来。……他从那儿作时间旅行来到1965年。这时他41岁，正前往松树丘访问他衰老的母亲，……眨眨眼睛，便在时间上旅行到1961年。正是新年除夕，……”（同上：35-38）。这时罗兰·韦锐摇醒了他，他又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躲在德军的后方。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毕利每次时间旅行开始与结束的时间是一样的，即从什么时间开始旅行结束时就又回到起点，每次都构成一个圆。正如在第一章末尾便规定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那样，在《五号屠场》作者不断地画着类似的圆，好象预示着一个又一个人生命的结束，一切都是注定的，人类根本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人们只能用541号大众星生物那样轻松、释然地对待死亡。

《五号屠场》叙事上的另外一个特点为“就这么回事”的重复使用。在短短的215页中，这句话竟重复使用了一百多次。战争的残酷导致了世界的混乱无序，社会的混乱和人生的无望。人们被无理性所包围，在强大外力面前，任何人都变成了官僚决策和命运的玩物，仿佛人们的生活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大部分美国人企图从礼品店里找到的物品中建立某种有意义的生活”（同上：32）。所以，几乎每次简单地交代完一件事后，作者都会用这句话作为结尾，好象不愿意就此事再说什么或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实际上，作者的二战经历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而德累斯顿的记忆梦魇一般令他难以释怀，这简短的话语正可表达了作者对荒诞现实的愤怒与无奈，在这里任何语言都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

4. 结论

简而言之，冯尼格在《五号屠场》中运用荒唐可笑的平面人物、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和荒谬失真的叙事手法无情地揭露和辛辣地讽刺了战争的残酷、社会的不公和人生的荒谬。

参考文献：

1. Bradbury, Malcolm.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Harris, Charles B..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s of the Absurd*. New Haven: College & University Press Services, Inc.. 1971.
3. Harris, Charles B.. *Time, Uncertainty & Kurt Vonnegut, Jr.: A Reading of "Slaughterhouse-Five"*. *The Centennial Review*. 1976. 20.
4. Klinkowitz, Jerome. *Slaughterhouse-Five: Reforming the Novel and the World*. Boston: Twayne Publisher. 1990.
5. Kuhn, Helmut. *Encounter with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Existentialism*.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6.
6. Pratt, Alan R.. *Black Humor Critical Essay*. New York & London :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3.
7. 阿尔伯特·加缪. 西绪弗斯神话. 法国伽利玛出版社. 1942.
8. 黄晋凯. 荒诞派戏剧.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9. 李 钧. 存在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10. 云 彩、紫 芹、曼罗译. 库尔特·冯尼格特. 五号屠场. 译林出版社. 1998.

The Forms of Absurdity Representation in *Slaughterhouse-Five*

Xiulan Zhao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how absurdity is presented in the novel *Slaughterhouse-Five* on the basis of the text-analysis and existentialism.

Key words: absurdity; Vonnegut; *Slaughterhouse-Five*

(责任编辑：甘艳芬、胡 雯、卫 妮)